

冯雪峰现实主义理论的几个特点

□ 巩淑云

命的文艺运动》中说：“文艺思想上的现实主义，是应着民主主义的民族革命的要求，应着反帝反封建的的思想和文学革命的要求，从西欧、北欧和俄罗斯输入到我们民族里来了，但立即就开有着‘民族化’的过程。而这‘民族化’的过程，就是我们新文艺的创造和生长的过程，是经过了我们反映着现实革命斗争的二三十年来的思想斗争和文艺斗争而表现出来的。”（《雪峰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121）所以，决定现实主义的发展及其各方面问题的是一个根本的现实基础，就是中国革命的社会性质、任务及其发展。“这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及其现实主义的社会基础。很明白，从‘五四’以来的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首先是受我们文学所负担的革命的、政治的任务所决定的。因此，我们无论考察它的来源，它的发展，它在各个阶段中的一般特征，都应当首先注意这一个社会基础。”（《冯雪峰论文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486）所以，在冯雪峰看来，现实主义在中国是植根于中国的现实矛盾中的。恰恰是因为植根于中国的现实矛盾中，因而现实主义会随着矛盾的发展和深化而发生变化，这是现实主义的“现实性”，“现实主义自身的法则，能够解决现实主义文艺自身的矛盾和问题，那就因为现实主义的法则正是反映着现实的发展的规律的缘故，它正在不断地从现实得到修正，扩充和发展的缘故。也正惟这一层，才是现实主义最根本的精神，它不同于别的艺术态度和方法的地方也就在此；它首先的态度就是使艺术及其方法不离现实及现实的发展。”（《雪峰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162）

因为植根于矛盾中的现实性，所以文艺在阶级社会中便具有不言而喻的阶级性。在《常识与阶级》一文中，冯雪峰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几乎一切事物都有阶级性，因为人们的生活既已分为阶级了，则各人生活上所需的东西，也当然有阶级的分别。”（《冯雪峰论文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25）人们生活中最起码的常识都有阶级性，文学的阶级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在就苏汶提出的“第三种文学”引起的争论中，冯雪峰非常果断地认为一切文学“都是斗争的武器”，一切文学都是有阶级的。如果做一个最为直观的界定，那么冯雪峰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倾向是文学的反映论，也就是说任何文艺作品不仅反映着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反映客观现实和客观世界。但是这种反映不是被动地作为现实的镜像，而是上文所说的处于矛盾之中对现实的介入，因而他非常强调文学的真实性，也强调典型的创造性和创造典型时“社会的，世界的，历史的矛盾的斗争和在这斗争中人的实践”（《冯雪峰论文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175）。同时，“这种反映是根据着作者的意识形态、阶级的世界观的，到底要受着阶级的限制的。”（《冯雪峰论文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100）但是，受到阶级的限制不是说文艺丧失了能动性，恰恰相反，文艺的阶级性反映出文艺的阶级任务和“做阶级斗争的武器”的意义。同时，冯雪峰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认为任何阶级都具有本阶级的局限性，而只有无产阶级有“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的思想”，才能接近客观的真理。这一点正如卢卡奇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分析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始终从个别资本家的立场出发来观察经济生活，而资产阶级又具有独断论的历史观。所以，个人利益与自然规律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就是资产阶级缺乏历史的整体观的矛盾。“只有阶级才能在行动中冲破社会现实，并在这种现实的总体中把它加以改变。因此从这种观点做出的‘批判’是对总体的考察，从而使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在这种不可分的辩证统一中，阶级既是历史—辩证过程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既是历史—辩证过程的反映，也是它的动力。无产阶级作为社会思想的主体，一下子打破了无所作为的困境，即由纯规律的宿命论和纯意向的伦理学造成的困境。”（《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11：92—93）因为无产阶级的优越性，所以冯雪峰提倡“人民力”，也提倡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学的大众化。

冯雪峰的现实主义理论是基于中国革命的矛盾斗争和紧迫性的，文学的价值本身就是政治的价值，因而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是对现实的反映，还是对于现实的介入。而在这样的现实矛盾中，作为“历史—辩证过程”的反映和动力的阶级成为反映现实和改变现实的核心，而无产阶级主体和文化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

无产阶级主体的构建与形成——冯雪峰现实主义理论的政治意涵

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左翼文学理论家们要处理的最基本的问题，当然也是贯穿冯雪峰文艺理论始终的问题。但是后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往往将文艺和政治先在地看作二元对立的子项，将冯雪峰的文艺理论轨迹概括为从政治凌驾于文艺到逐渐承认文艺的自律性的过程。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冯雪峰的现实主义理论印因为其强烈的政治诉求而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艺自身的规律，也确实存在过于宽泛的问题，正如温儒敏对他的评价：“冯雪峰所说的现实主义指的是一种正视并揭露现实的创作‘精神’或‘倾向’，概括面是相当宽的；甚至认为像李白这样的公认的浪漫主义诗人，其‘精神的积极方面’，也可以‘概括到现实主义之内去’。这种对现实主义的解释未免过于宽泛，多少还滑到现实主义‘独尊论’边上去了；这种理解，在过去有相当的代表性。”（《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然而在笔者看来，冯雪峰的现实主义理论恰恰因为其政治性而具有深刻的意义。

具体而言，文艺和政治本身并不是全然对立的，而这种对立恰恰是反思新文学时“去政治化”的过程所建构出来的。如上文所分析的，现实主义理论因为其现实性和阶级性而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不是被赋予文艺的，而是来自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因而就存在于文艺自身之中。在《文艺与政论》一文中，冯雪峰清晰地指出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是文艺和生活的关系的根本形态，因为文艺是生活的实践，它和现实生活的相互关系就构成它和现实社会生活之间的政治的关系；这和政治事业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实践的关系在

根本上是没有两样的。”（《冯雪峰论文集》（上））因而“艺术的价值不能和政治的价值并立起来；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政治的价值。”（《冯雪峰论文集》（上））所以，对于冯雪峰的文艺理论的分析如果仅仅停留在文艺和政治的二元对立关系并得出要辩证地看待二者的关系的话，反而消解了冯雪峰的文艺理论的政治内涵。现实主义在革命中国具有极大的亲和力，而其有效性正在于现实主义最大程度地将文艺的阶级性实践化为新的政治主体的形成，具体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则是无产阶级主体的形成。

这一点可以借助于杰姆逊在2013年出版的《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The Antinomies of Realism）中的观点来理解。在《二律背反》的导言中，杰姆逊提出，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对知识或者真理的“认识论上的宣称”（an epistemological claim），强调真实、客观、现实等，这是现实主义最为特殊的一面。同时它又具有美学理念（aesthetic ideal）上的诉求，强调写作手法、审美风格、创造技巧等等。一方面是认识论上的宣称，一方面是审美理想的诉求，这就造成了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因而这种背反性现实主义成了一个大杂烩式的概念。杰姆逊将现实主义这个大杂烩的概念进行理念上的剖析，他认为支撑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理念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及其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The Antinomies of Real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13. p.5）。正是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去思考资产阶级作为新的群体如何去构建新的社会秩序，形成新的社会主体。如果将这个逻辑放到“五四”后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现实中，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极端动荡的时期，旧的社会秩序已然崩坏，新的社会秩序仍未建立，而新的社会秩序需要新的政治主体的形成和实践。所以，现实主义在革命中国形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在中国“民族化”的产物，也是以文学作为实践空间以对无产阶级这一政治主体的呼唤和构建。

所以，冯雪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意涵在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对现实的描写和介入，第二则是对无产阶级形成的实践。这在《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在北京教师进修学院的讲话》所引用的高尔基的原话中非常清晰地体现出来：“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雪峰文集》第二卷）所以在冯雪峰的现实主义理论中，大众化、人民力的问题始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首要问题，而在左联的决议中（《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新任务》）就已经将文学的大众化问题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新路线中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今天我们重读冯雪峰的现实主义理论时，必须跳过文艺和政治相互对立的二元论思维，在中国革命的历史性中抓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现实性和阶级性，从而从其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意涵的文艺理论中去看到无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主体的登场与形成。



经典作家之冯雪峰

在现实主义的建构中，冯雪峰是对现实主义理论进行深入思考的重要理论家之一，也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多次文艺论战的当事人和“左联”的领导人。他的现实主义理论在他丰富的文艺理论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也具有强烈的历史在场性，因而冯雪峰成为研究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坐标式的人物。基于现实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实质，冯雪峰的现实主义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参照去回答这样的一些问题：为何现实主义与20世纪初期革命的中国有如此强烈的亲和力？除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上的特征，它有什么样的实质性和迫切性使之一度成为“君临”状态的文学理论？而作为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建构者的冯雪峰又是如何抓住了现实主义的内核使之左右了新文学走向的？

现实性和阶级性——冯雪峰的现实主义理论内核

在1952年的《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原为《文艺报》解答读者所提问题而做）一文中，冯雪峰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中的现实主义脉络，他认为“五四”新文学发展到现在的主潮是现实主义，它的来源之一是中国古典现实主义，这种“平民文学”及其革命精神为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这种革命精神首先是以中国社会内部的革命为基础，贯穿了中国社会中以阶级斗争和新旧斗争为主的矛盾斗争；二是欧洲近代和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尤其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借助其“战斗性和进步思想”反对旧文学，建立新文学。进入中国的现实主义思潮既借助古典现实主义，又不断被“民族化”而成为中国的现实主义。他在《论民主革

2016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65周年，也是冯雪峰逝世40周年，12卷本的《冯雪峰全集》正式出版。这是对著名的诗人、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的最好纪念。

文学家冯雪峰

冯雪峰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在文学创作、文艺理论与批评、翻译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显著成就。雪峰，是他最常用的笔名。上世纪20年代初期，他与诗友在杭州西湖之滨成立湖畔诗社，共同出版诗集《湖畔》《春的集集》，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早的白话诗集之一，也使雪峰赢得了“湖畔诗人”的声誉。

冯雪峰的杂文创作深得鲁迅杂文的精髓和神韵，从“左联”时期开始，到抗战末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创作的杂文视野广阔，内容多样，他的杂文集《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跨的日子》等，都是现代杂文史上的杰作。

冯雪峰在现代寓言的创作上更是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文学创作肇始于诗歌，而绝笔于寓言。雪峰的寓言继承中国古典传统又有开拓创新，在揭露黑暗、讽刺时弊和文化意蕴的呈现上与他的杂文有异曲同工之处。雪峰为中国寓言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被誉为中国现代寓言的奠基者。

冯雪峰对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建设上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从1926年起，他系统地翻译介绍《新俄文学的曙光期》《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文学》《新俄的文艺政策》及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的基础》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思潮、文化建设动态方面的书籍。还翻译介绍了列宁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书籍和高尔基、石川啄木等作家的作品。同时也翻译了匈牙利马察尔的《现代欧洲的艺术》，在国内几乎最早系统介绍了未来派、立体派、表现派等欧洲现代派文艺思潮。前后共出版翻译著作13种，发表单篇译文30多篇。他以自学的日语功底，以顽强的“硬译”精神，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为独树一帜的翻译家。他还和鲁迅一道编辑出版了“新俄文艺论述丛书”“科学的艺术论丛书”“文艺理论丛书”等，对指导中国新兴的革命文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在“革命文学”论争、“两个口号”论争等文学论战中，他的理论文章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导引作用。他的《革命与智识阶级》《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论‘保卫延安’》《中国文学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等都是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经典篇章。

冯雪峰与鲁迅

冯雪峰与鲁迅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1928年5月，冯雪峰写下《革命与智识阶级》的时候，尚未与鲁迅相识，在鲁迅受到围攻的情况下，雪峰在文章中充分肯定了鲁迅的功绩和“五四”文学传统，对鲁迅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年底，冯雪峰与鲁迅相识，成为鲁迅晚年最亲近的学生和战友之一，在鲁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发挥了纽带和桥梁的作用。在白色恐怖中，他们共同冒着生命危险编辑《前哨》，纪念牺牲的“左联”五烈士。在鲁迅逝世前半年，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从陕北回到上海，向鲁迅介绍党的方针政策，使鲁迅加深了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信赖。在鲁迅病中，他代替鲁迅草拟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等多篇重要文章，对维护左翼文艺界的团结，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冯雪峰被公认为是鲁迅研究的权威和“通人”。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致力于鲁迅著作的注释和出版工作，并写下大量回忆鲁迅的文章，为鲁迅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出版家冯雪峰

冯雪峰也是杰出的出版家，为新中国的文学出版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51年冯雪峰受命组建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拟定出版方针时，提出要出版中外文学名著，不仅要有延安以来的工农兵文艺，还要有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不

一位崇高而坚韧的文化将领

——写在《冯雪峰全集》出版之际

□王海波

仅要有现代文学，还要着手古代文学遗产的整理；不仅要有苏联文学，还要有欧美等国家的古典名著和现代名著的系统介绍。这个思路 and 构想后来被概括为：古今中外，提高为主。这成为新中国文学出版工作的指导性方针，全面奠定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建立和发展的良好基础。

在他任职的7年中，出版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当代创作近500种，其中被称为“红色经典”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保卫延安》《暴风骤雨》《新儿女英雄传》《铜墙铁壁》《野火春风斗古城》《吕梁英雄传》《林海雪原》等著名长篇小说，影响了几代人，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他主持出版现代文学的标志性作品《家》《子夜》《骆驼祥子》《女神》等数十种，出版40多位现代重要作家的各类选集，并启动了《瞿秋白文集》（4卷）、

《沫若文集》（17卷）、《巴金文集》（14卷）、《茅盾文集》（10卷）等大型图书的编辑出版，使五四新文学的成果第一次得到系统的整理，展示了我国现代文学的巨大成就。

在他的指导下，1952年9月出版了新的整理校注本《水浒传》，标志着新中国整理出版古典文学的开端。随后雪峰主持制订了《整理古典文学选题计划》，相继整理出版《三国志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封神演义》《牡丹亭》《西厢记》等主要古典名著，编注出版了重要的古代诗人、散文家、戏曲家的个人选集30多种。还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副牌印行古代总集、别集、专集、小说、笔记等善本图书68种。

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起便大量翻译出版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恰巴耶夫》以及高尔基的《母亲》等充满革命激情和爱国文学精神的苏俄革命文学作品。同时，冯雪峰还支持制订《世界文学名著介绍选题计划》，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翻译出版外国文学名著的主要作品，以及各国重要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到1957年底，翻译出版了41个国家的文学图书530种，涵盖外国文学的各个门类。还启动了《莎士比亚戏剧集》（12卷）、《高尔基选集》（17卷）等大型图书的翻译出版。

雪峰还重视出版普及性的图书，自1953年起安排出版“文学初步读物丛书”四辑80种，以“艺术出版社”、“戏剧出版社”的副牌，出版大量为读者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学、曲艺、歌曲、电影剧本、传统戏剧等图书，以满足不同文化层次读者的需要。

在冯雪峰主持工作的7年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各类图书2200多种，创立了高起点、多门类、多层次、多样化的图书格局，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冯雪峰全集》：全面汇总雪峰各时期、各领域的创作

在冯雪峰逝世40周年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冯雪峰全集》。一直致力于为他人出书，为国家出

版事业出力的编辑出版家冯雪峰的著作首次得以全面的整理出版。在文学创作方面全集收录冯雪峰的《湖畔》《真实之歌》等诗集4部（包括合著），和集外诗歌30首，小说散文多篇。冯雪峰所写第一篇文学作品《到省议会旁听》收在集外诗歌中。全集收录《今寓言》《雪峰寓言三百篇》（上卷）等寓言集4部，改编国外寓言故事集《百喻经故事》《富翁造三层楼》，以及集外寓言和首次整理面世的寓言遗稿60余篇。冯雪峰平生最后的文学作品《锦鸡与麻雀》收在集外寓言之中。杂文论文方面收录《乡风与市风》等杂文集3部，《过来的时代》《论文集》（第一卷）等论文集5部，以及近百万字的集外杂文与论文。全集还收录两个不同版本的回忆录《回忆鲁迅》和少儿读物《鲁迅和他少年时候的朋友》、电影文学剧本《上饶集中营》。这些创作于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几乎涵盖了文学的各种形式，全面反映了冯雪峰一生的文学成就。

全集以三卷的容量收录了他留下的将近150万字的翻译著作。不仅为雪峰的翻译实践做了一个全面汇总，也为中国现代翻译史留下了早期翻译状况的宝贵资料。

除文学和翻译之外，全集还收录了冯雪峰的书信、日记、编务文稿、政务文稿函件和外调材料等，可以说内容相当丰富，并且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和意义。书信部分是冯雪峰1922年至1975年间与作家、文学研究者、同事、亲友和有关机构的通信160余封，大部分都是以前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日记写于1965年至1975年间，也是根据未发表的手稿收入。这些资料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冯雪峰的工作生活状况，特别是其中“四清”和“干校”时期的日记，也为时代留下了记录。编务文稿是冯雪峰从事编辑工作时为所编刊物而写的消息、补白、编刊后记，为所编图书而写的编辑说明、审稿意见，为出版社起草的工作安排、编辑计划、规章制度等有关文字，也具有一定

的史料价值。政务文稿函件收入冯雪峰长征时的笔记资料，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的工作报告、函电，及其他有关政务工作的文字。冯雪峰留下的长征笔记涉及红军第一军团长征经过的地点及里程、经过的民族区域、所处的环境状况、经过的名山大川关隘封锁线等情况，是长征的真实记录和研究长征的宝贵资料。

冯雪峰1936年4月奉中央之命重回上海，负有艰巨的使命。一方面与鲁迅联系，沟通党与上海文化界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为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并团结各方力量贯彻中央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而工作。这期间他化名李允生，战斗在党的隐秘战线，他以秘密的书信和报告的形式为陕北中央输送了大量情报资料，为党的决策提供参考。编辑《冯雪峰全集》的时候，我们尽可能搜集了现在可以公开发表的书信和报告，这些既是冯雪峰不惧艰险为党工作的见证，也是党史研究的宝贵资料。

外调材料是“文革”时期冯雪峰应单位、机构或个人出于调查或证明的需要，被要求写下的历史材料，是对历史事件或人物活动情况的证明。全集中收录的外调材料写于1966年至1973年，约有200篇，80余万字，主要写作地点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湖北咸宁干校。我们编辑全集所依据的是这些外调材料的底稿，这些底稿是在被收缴之后即将付之一炬之时，被当时出版社的编辑陈早春先生抢救出来交还给冯雪峰的。对这些珍贵的历史材料的收录，全集遵循“基本不做改动，保存历史原貌”的原则。外调材料这样的文字出现在作家全集中本就是极其少见的，这样大的分量，更是绝无仅有的。

冯雪峰这样一位有着多重身份的重量级人物，作为党的文化将领，始终置身于时代风云的潮头，是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和记录者。《冯雪峰全集》无疑已经不是一般文学意义上的全集，而是一部承载着丰富内容，超乎文学之上的大部

本专刊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